

锡伯族 历史探究

吴元丰 赵志强 著 ● 辽宁民族出版社

锡伯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历史上锡伯族居住区域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伴随着居住区域的变化，其相邻民族也有变化。因此，锡伯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居住区域及其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就成为锡伯族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主要依据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对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的关系试作探讨。 谨请同仁赐教。

锡伯族 历史探究

吴元丰 赵志强 著 ●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吴元丰, 赵志强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锡伯族历史探究 / 吴元丰, 赵志强著.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80722-553-9

I. 锡… II. ①吴… ②赵… III. 锡伯族—民族历史—研究 IV. K2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601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2 $\frac{3}{8}$

字 数: 340 千字

插 页: 2

印 数: 1-1500

出版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王 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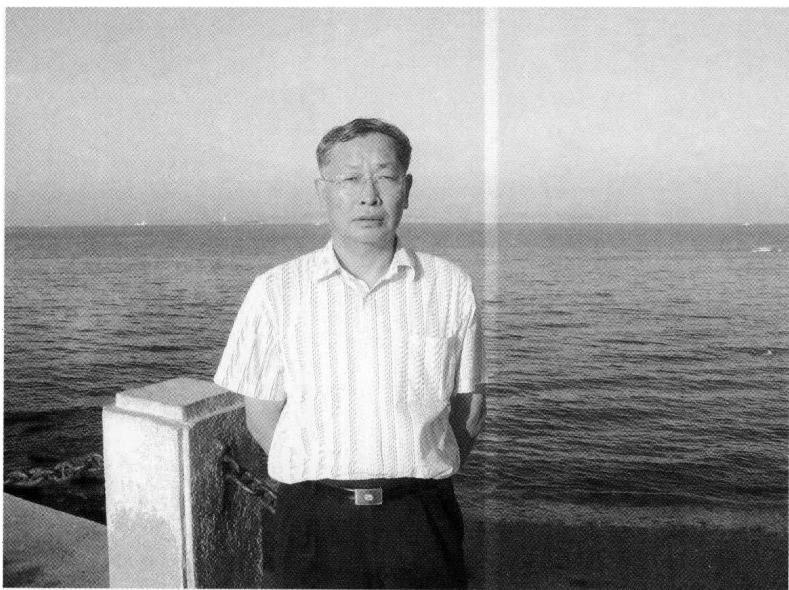
定 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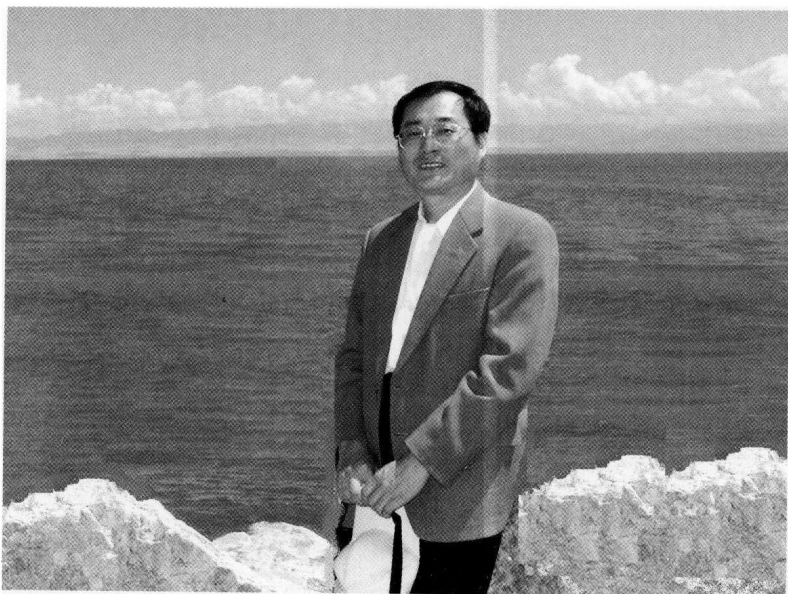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c@mail.lnpgc.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吴元丰 锡伯族，1956年8月出生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1978年、1986年分别毕业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干部培训班和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历史系。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研究馆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史研究会理事、中国蒙古史研究会理事、北京满学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康熙朝内阁蒙古堂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和《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14部400余册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还研究满文典籍、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和中琉关系史，发表论文60余篇。



赵志强 锡伯族，1957年2月出生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满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满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满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员、黑龙江省阿尔泰学学会会员、黑龙江省满一通古斯语言学会会员、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从事满学、清史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旧清语研究》（2003年，北京燕山出版社）、《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2007年，科学出版社），合著《锡伯族简史》（198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学术论文50余篇。

序

佟钟时

元丰、志强是锡伯族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从事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及研究工作，至今已有30余年。现元丰担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并被文化部聘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志强已调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所长，并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除做好本职工作和有关的社会工作的前提下，还为锡伯族的历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这部《锡伯族历史探究》论文集即是他们多年研究成果的最好见证。

锡伯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锡伯族总人口为188 800人，主要分布在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锡伯族发源于我国东北的兴安岭和嫩江、松花江流域，历史悠久。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族正式编入清朝八旗组织，分驻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吉林的伯都讷（今扶余县）和乌拉（吉林市）三城。八旗组织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具有军事、

行政和生产三项职能。不久，为了调整东北、北京地区的防务力量，锡伯官兵奉命携眷移驻辽宁和北京地区。18世纪中叶，为了屯垦戍边和加强西北防务，辽宁地区的1020名锡伯官兵，又奉命携眷移驻新疆伊犁。从此，这部分锡伯族便扎根西北边陲，驻卡巡边，开荒种田，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默默奉献。因而也形成了今天锡伯族分居东北和西北两地的格局。

元丰、志强两位学者出于对本民族历史的热爱和探索欲望，从浩如烟海的满汉文档案中查找出有关锡伯族的档案资料，先后编译出版了满文版的《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和汉文版的《锡伯族档案史料》二书，为锡伯族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拜读《锡伯族历史探究》一书，其中收录的元丰、志强两位学者撰写的《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的关系》《锡伯族源探微》《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始末》《吉林乌拉锡伯世管左领源流考》《锡伯族西迁概述》等论文就是利用了他们整理的清代档案资料，论证了锡伯族的族源、迁徙等情况，首开利用档案研究锡伯族历史的先河，澄清了学术界多年没有解决的诸多问题。

对锡伯家庙的考察和研究，是元丰、志强两位学者对锡伯族历史文物研究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又一贡献。30年前，他们亲临沈阳调查走访，通过《沈阳锡伯家庙考察记》《锡伯家庙碑文考》等文章，论证了《沈阳县志》中提到的太平寺即是锡伯家庙的结论是正确的，对家庙规模、建筑、供奉物品、举行的活动及其满文碑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解读，为恢复、修缮和保护现被列入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锡伯家庙提供了比较翔实而可靠的依据。

我与元丰、志强两位学者相识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20 多年来，幸蒙不弃，在他们来东北考察、参加学术会议之际，得以促膝长谈，共同探讨锡伯族的历史，获益良多。更令我欣慰的是，我们略尽地主之谊，为两位学者的研究、考察提供了些许便利，而他们将此铭记在心，报以丰硕的研究成果。

此次应邀为元丰、志强两位学者的论文集《锡伯族历史探究》作序，同胞情谊，盛情难却，寥以数语，权作学习，与友人共勉。

2008 年 4 月 18 日

前 言

1975年，对我们两个人来讲，既非同寻常，又终生难忘，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这年一次偶然的机遇，竟然改变了我们两人的人生命运，确定了自己的工作航标。早在1972年春，我俩同时应招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中学上高中，被分到一个班学习，并且在一个寝室里起居生活，从而成为过从密切的朋友，共同渡过了三年高中阶段的快乐时光。1975年7月毕业在即，恰逢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派人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招收学员，引起学生轰动，都积极报名，希望能到北京学习和工作，然因招生名额有限，竞争还很激烈。众所周知，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个人少有选择未来学习或工作的机会，因此我俩也未作任何考虑就报了名。幸运的是，两人一同被录取，又一同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学习。到北京后得知，事情源于当时周恩来总理了解到满文档案专业人员十分匮乏的情况之后，考虑到当时全国高校教学工作尚未步入正轨，为了有效培养满文专业人才，保证满文档案事业的长足发展，特别批示国家文物局在故宫博物院开设了“满文干部培训班”，从北京、新疆和黑龙江招收学员21名，聘请专门的

教师授课。“满文干部培训班”学制三年，教学规程非常严密，没有寒暑假，实行严格的考勤和考试制度。通过三年的学习，我们不仅掌握了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基础知识，同时也具备了从事明清历史档案工作者应有的基本素质。

1978年7月“满文干部培训班”结业后，全班所有毕业的学员都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前身）工作，专门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此时幸运再次光顾，刚刚开始工作不久，“文革”即告结束，继而推行改革开放，各项事业逐步纳入正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作为满文档案工作者，很想结合本职工作开展一些学术研究。但是，由于刚刚参加工作，无论是工作经验，还是学术研究能力，都很匮乏，一时很难确定发展方向和研究领域。经过再三思考和分析，决定从自己从小耳熟能详且充满好奇，并在当时来讲研究基础还很薄弱的锡伯族历史着手，对锡伯族历史作一探索。当时有关锡伯族历史的研究成果和史料，非常少见，因此发掘和收集史料，就成为锡伯族历史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从1978年始，利用节假日和晚上等业余时间，从馆藏1000多万件满汉文档案里查找锡伯族史料，日复一日，随着查阅档案数量的增多，收获越来越大，振奋之余，向单位领导提请编译出版锡伯族专题史料，很快被批准纳入工作计划。此时除了继续从馆藏档案中查找外，还先后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查阅档案，共查得有关锡伯族历史的满汉文档案1000余件，随之开始进行史料的编译工作。1987年3月，《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上下2册，满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

7月,《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2册,汉文),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在编译档案史料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发现的档案史料开展研究。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安俊先生合作撰写的专著《锡伯族迁徙考记》(锡伯文),1982年8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族简史》(锡伯文),1985年2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我们两人还合作编写《锡伯营职官年表》(锡汉文合璧),1994年3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向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四十周年献礼之书籍。

与此同时,我们两人又合作撰写研究锡伯族历史的论文和文章,刊载于有关报纸杂志,共计16篇。这种合作撰写文章的过程,从1981年在《民族研究》上发表首篇学术论文《锡伯族西迁概述》开始,直至1995年在《民族文学》上发表《〈西迁之歌〉评述》为止,整整持续了15年时间。后来由于赵志强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调到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工作,外加两个人又各自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坐在一起讨论和研究的时间相对减少,故而停止合作撰写文章,开始独立撰写,先后发表的有关锡伯族历史文章吴元丰有5篇,赵志强有3篇。共同署名发表论文之初,不少老师、同学、同事、同乡和朋友,总是问一个问题,你们俩人合作发表论文,为什么署名顺序有所不同呢?每当问起这个问题,我俩就相对会心一笑,从不多加解释,作为两个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保留到现在,值此论文集出版之际,有必要向所有曾经关心过的老师、同学、同事、同乡和朋友们作一说明,并表示诚挚的感谢。当初在共同收集和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的过程中,每当发

现新的史料或遇到新的问题，我们都会及时交流和讨论，久而久之成为一个习惯，合作写文章的冲动也由此而发，起初撰写文章，每次都共同讨论拟定两个题目及其框架，然后每人负责起草一篇。等草稿形成后，相互交换审阅，最后共同讨论定稿。此外，事先有个约定，文章写成发表之时，负责起草者署名在前。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始终在信守这一约定。

时光荏苒，从1981年发表处女作《锡伯族西迁概述》迄今，已经过去了27年时间。27年当中，合作或独立撰写发表的有关锡伯族历史文章共计24篇，其中大部分是我们俩人共同撰写的文章。为了便于大家查阅，今辑录业已公开发表的24篇和尚未发表的1篇（即《历史铭记你》），共计25篇文章，编辑出版。此书附有《锡伯营职官年表》一书中的官员履历，以及《一个民族的长征》、《倾情锡伯族史研究》两篇媒体专访稿。本书收辑的所有文章，均未经大的修改，只是文字方面略有改动，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每篇文章之后，尚标有原载刊物的名称和时间。

在编辑出版本文集过程中，得到了辽宁民族出版社吴昕阳、辽宁省档案馆何荣伟的热情支持，并承蒙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佟钟时先生欣然应邀作序，在此谨表谢忱。

吴元丰 赵志强

2008年2月22日

目 录

锡伯族源探微

——“女真后裔说”质疑 赵志强 / 1

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的关系

关系 吴元丰 / 15

试论 16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锡伯族的社会经济

经济 赵志强 吴元丰 / 25

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

始末 吴元丰 赵志强 / 38

锡伯族南迁概述 赵志强 吴元丰 / 49

锡伯族西迁概述 吴元丰 赵志强 / 58

锡伯族迁居云南考 吴元丰 赵志强 / 73

吉林乌拉锡伯世管佐领源流考 赵志强 吴元丰 / 76

清代伊犁锡伯营综述 吴元丰 赵志强 / 83

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变迁 吴元丰 赵志强 / 99

清政府对锡伯族的统治政策 吴元丰 / 109

清代锡伯族对祖国的贡献 吴元丰 赵志强 / 123

清代呼兰地区的土地开发

——兼谈锡伯族的贡献	赵志强	吴元丰 / 143
锡伯家庙碑文考	赵志强	吴元丰 / 157
沈阳锡伯家庙考察记	赵志强	吴元丰 / 174
北塔法轮寺与蒙古族满族锡伯族关系述论	赵志强	181
锡伯族的姓名	赵志强	吴元丰 / 194
锡伯族的西迁节及其由来 *		吴元丰 / 218
《西迁之歌》评述	赵志强	吴元丰 / 220
双城县锡伯族考察记	吴元丰	赵志强 / 256
历史铭记你——赞察布查尔大渠	吴元丰	赵志强 / 267
《锡伯族档案史料》简介	吴元丰	赵志强 / 273
新近发现的锡伯族档案及其研究价值		吴元丰 / 281
有关锡伯族人改编旗籍的一份满文档案及其 研究价值		吴元丰 / 290
近十年锡伯族史研究综述		赵志强 / 312
附录一：清代伊犁锡伯营官员履历及索引		/ 320
附录二：一个民族的长征*		/ 372
附录三：倾情锡伯族史研究		/ 383

锡伯族源探微

——“女真后裔说”质疑

赵志强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众说纷纭，由来已久。其中，“女真后裔说”认为：锡伯族与满族同祖，是女真人的后裔。从近期发表的有关论著来看，“女真后裔说”和其他诸说一样，缺乏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要令人信服，还须不懈的努力。笔者撰此拙文，无意否定其说，实为质疑问难，求教于方家。

一、清太宗的谕旨能否证明锡伯是女真后裔？

有些论著中，清太宗皇太极为更改族名而降的一道“上谕”是“女真后裔说”的证据之一。考其出处，或引自汉文《清太宗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或引自满文档案。既然是“圣旨”，且如此重要，就应正确诠释，不能曲解了旨意。遗憾的是，近年来发表的有些论著，对此“上谕”多有曲解之嫌，为了叙述方便，先将常被引用的《实录》所载谕旨原文全引如下：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为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①

在这道谕旨中，最关键的一句是“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这句话，就其文句而言，应该说是浅显易懂的，不该有任何歧义。如果是因为“文义不清”而发生了误解，那么，《实录》的汉文是从其满文本翻译而成的，让我们看看这句话在满文《实录》中是怎么记载的，译成现代汉语是什么意思。原文说：

jušen serengge, sibe i coo mergen i hūncihin kai, tere muse de ai dalji.^②

译文：那诸申是锡伯超墨尔根的后代啊，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要是追本溯源，则满文《无圈点档》和《国史院档》中还可见到清太宗的这道谕旨^③。上引满文《实录》一句，与《无圈点档》和《国史院档》的不同之处，只是把原先连写的“sibe i”分开，写成“sibe i”。按满文的书写规则，这两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这句话中的“hūncihin”一词，有人译为“族人”，也有人译为“同族”。这些不同的译文固然也不错，但引用时必须注意，这里的“族”应该是“宗族”、“家族”的意思。有的论著中，把这个“族”和现在的“民族”混为一谈，似乎有点偷梁换柱的意味，这是不可取的。

以上是对清太宗谕旨文句的一些阐述，下面接着讨论两个问题。

1. “超墨尔根”是地名，还是人名？从上述谕旨看，显而易见，清太宗所说的“超墨尔根”是人名，而不是地名。可是，有些论者却认为，“超”就是绰尔河，墨尔根就是现在的嫩江市。也有人认为，“超”就是汉语的“超过”，“墨尔根”就是今天黑龙江省的嫩江县（市），因此，所谓“超墨尔根”是指距离墨尔根还要远一些的地方，也就是嫩江支流甘河上源的嘎仙洞。按常理，人是有后代的，“地方”岂有后裔？所以，地名之说毋庸多说，不攻自破矣。

类似“超墨尔根”这样的人名，在满族、锡伯族等北方民族中曾经是比较常见的。譬如，族属有争议的清开国第一功臣费英东的先辈中，就有人名为“罗罗墨尔根”、“常喀尼墨尔根”，费英东的第四弟名为“音达户齐墨尔根”；“世居苏完地方，国初来归”的人中，有人名为“吴库努墨尔根”^④。有人认为，“超墨尔根”之“超”为单名，“墨尔根”是绰号或尊称。笔者认为，有这种可能，但在没有充分的证据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把“超墨尔根”完整地看作一个人名是比较稳妥的。因为，满族、锡伯族有些人名中的“墨尔根”、“巴图鲁”，就像某些蒙古人名中包含“戴青”、“巴图尔”等词语一样，只是人名的组成部分，与绰号、尊称或官爵、功名等没有必然的关系。

顺便提一句，有些论著认为近年发现的“瓜尔佳氏家谱”里的“超墨尔根”就是清太宗谕旨中提到的“超墨尔根”，并由此大谈锡伯族源，甚至有人宣称长期以来关于锡伯族源的争论可以结束了。这未免过于轻率，过于武断了。别的尚且不说，仅家谱和谕旨中出现的“超墨尔根”而言，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是同名的两个人。在没有排除同名的可能之前，贸然视为一人，这种做法是极不妥当的。

2. “夫诸申之号，乃席北（锡伯）超墨尔根之裔”之句中，谁是“本”、“源”？谁是“末”、“流”？很明显，在清太宗看来，锡伯包括诸申，诸申只是锡伯的一部分。用一棵树来打个比方，则锡伯是树干，超墨尔根是其分枝之一，而诸申是长在这一分枝上的一个小枝；用一条河来打个比方，则锡伯是主流，超墨尔根是其支流之一，而诸申是流入这一支流的一条小溪。简而言之，锡伯是“本”，是“源”，而诸申是“末”，是“流”。且不论清太宗说的是否符合事实，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还是一清二楚的。然而，主张“女真后裔说”的个别论者竟然不顾起码的语法常识，把这句话“理解”为锡伯人的族属是诸申即女真人，锡伯人是女真人的一支，并说这是不可辩驳、不可否认的事实。有人更是歪曲原文之义，说“太宗以当时人谈当时事，明白地指出锡伯人乃诸申（女真）民族，是